Aging Research 老龄化研究, 2026, 13(10), 297-304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r
https://doi.org/10.12677/ar.2026.1310757

Hans汉斯

庇护与陷阱：社会支持对老年金融受骗风险的双刃剑效应

陆潭晟，张舒悦，田静茹，陈曼如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江苏 扬州

收稿日期：2026年6月8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15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27日

摘　要

随着人口结构变迁与数字技术普及，老年金融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本研究突破既有研究将社会支持单一归结为“保护因素”的线性思维，转而从社会互动与心理机制的双重视角，探究其对老年人金融受骗风险的非线性影响逻辑。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在风险防控中呈现出显著的“双刃剑”效应：适度的支持通过信息赋能与情感联结构建防护网络；而支持的过度嵌入或结构性失衡，则会导致信任机制异化与个体决策能力的系统性钝化，进而诱发“助骗”风险。这种由“庇护”向“陷阱”的转化，本质上是社会支持在特定阈值下功能异化的结果。基于此，研究主张构建一种动态适配的精准干预范式，强调在尊重老年人主体性的前提下，通过优化支持结构来平衡“外部保护”与“自主决策”的关系，从而实现从被动防御向主动韧性治理的转变。

关键词

社会支持，老年金融受骗，双刃剑效应，非线性关系

Shelter and Trap: The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on the Risk of Financial Fraud against Older Adults

Tansheng Lu, Shuyue Zhang, Jingru Tian, Manru Chen

Tongda College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Yangzhou Jiangsu

Received: June 8, 2026; accepted: October 15,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7, 2026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the prolife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文章引用: 陆潭晟, 张舒悦, 田静茹, 陈曼如. 庇护与陷阱: 社会支持对老年金融受骗风险的双刃剑效应[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10): 297-304. DOI: 10.12677/ar.2026.1310757

financial security for older adults faces severe challenges. Depart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linear perspective that categorizes social support solely as a "protective factor",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non-linear impact logic of social support on the risk of financial fraud among older adults through the dual lenses of social interaction and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The findings reveal a significant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in risk prevention: while moderate support constructs a protective network through information empowerment and emotional connection, excessive embedding or structural imbalance of support leads to the alienation of trust mechanisms and the systematic blunting of individual decision-making capabilities, thereby inducing "fraud-facilitating" risks. The transition from "shelter" to "trap" is essentially the result of functional alienation of social support when it exceeds specific thresholds. In light of this, this paper proposes transcending the mere resource-supply perspective by establishing a governance logic of "moderate empowerment". Policies and practices must precisely delineate the boundaries between external intervention and autonomous decision-making while respecting the subjectivity of older adults. By optimizing the timing and structure of support to circumvent the cognitive crowding-out effect caused by overprotection, this approach aims to transform anti-fraud efforts from passive physical defense toward an active governance paradigm that cultivates individual financial resilience.

Keywords

Social Support, Elder Financial Fraud,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Non-Linear Relationship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截至 2025 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3.23 亿，占总人口的 23.0%[1]，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在数字金融全面渗透的背景下，老年人因数字技能匮乏、金融素养偏低、认知功能衰退等特征，成为金融诈骗的核心侵害对象。数据显示，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中 50 岁以上群体占比高达 40%[2]，仅 2025 年第一季度全国 AI 换脸、拟声诈骗案件数量就环比激增 45%[3]。金融受骗已成为威胁老年群体财产安全、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风险点。然而，金融受骗并非纯粹的个体决策失误，而是高度嵌入于老年人日常互动网络中的社会性事件。当老年人面对复杂骗局时，他们往往主动或被动地寻求来自家人、朋友、邻里乃至社区组织的建议与介入，这一过程的核心载体便是"社会支持"[1]。现有研究对社会支持的作用存在"保护论"与"风险论"的二元分歧：传统观点认为社会支持是抵御诈骗的"安全网"，而近年研究发现过度或不当的社会支持反而可能成为"隐形陷阱"，弱化老年人的风险警惕性。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大多停留在线性假设，未能捕捉二者之间"适度则利、过犹不及"的非线性本质，本土化的实证研究更是寥寥无几。本研究旨在丰富老年金融风险与社会支持领域的理论体系，为全国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提供精准的政策依据，帮助政府、社区、家庭构建差异化、精准化的老年反诈支持体系，切实守护老年群体的"钱袋子"，助力积极老龄化与银发经济的健康发展。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打破传统线性研究的局限，系统揭示社会支持对老年人金融受骗风险的"双刃剑"非线性效应，厘清其作用边界与内在机理。

[1]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602/t20260228_1962662.html
[2]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53726755384408988&wfr=spider&for=pc
[3]https://credit.kaifeng.gov.cn/a827a0d18dea4d8f85ebce7384b1ff20.html

2. 现状审视：老年金融受骗的群体画像与社会支持的关联特征

2.1.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老年金融受骗群体画像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金融诈骗风险攀升，呈现显著结构性差异。城乡层面，农村老年人因信息闭塞、反诈宣传不足及金融认知薄弱，受骗频次更高；城市老年群体资产丰厚，虽信息渠道较广，但单次受骗损失更大。年龄维度上，低龄老人社交活跃、投资意愿强，更易暴露于骗局；高龄老人认知衰退、维权困难，止损难度更大。教育程度具缓冲作用，高学历者甄别能力更强，但可能因过度自信陷入复杂骗局。从心理特质与社会需求角度划分，老年受害群体可分为三类：一是情感缺失型，独居老人因陪伴缺位，易被温情关怀、公益服务等情感营销俘获；二是健康焦虑型，身体机能衰退催生健康需求，诈骗分子借此推销虚假诊疗与保健品；三是资产增值型，退休群体受低收益现实与高息承诺误导，盲目投资非正规项目致财产损失[2]。三类群体均呈现特定心理与社会需求驱动的受骗路径，需精准干预。

2.2. 老年金融受骗的多元类型与风险特征研判

老年金融诈骗形式多样，危害严重。养老投资诈骗以“合法外衣”掩盖非法目的，通过注册公司、获取背书等方式营造正规假象，实施身份、项目与收益的“三重包装”[3]。诈骗分子利用政策热词包装非法集资，以“保本高息”承诺制造幻觉。同时，电信网络诈骗转向精准定向围猎，通过线上话术诱导与线下当面交易结合，规避风控并博取信任，提升成功率。另一类骗局为虚假理财与保健品诈骗，利用老年人情感需求与认知短板，伪造政府或金融机构名义，以“保本保息”误导投资，或借健康焦虑推销保健品。当前，诸类骗局呈现融合趋势，部分诈骗主体将保健品与投资返利绑定，甚至假借公益吸纳资金，形成复合式骗局，加剧识别难度。针对不同类型的诈骗，其风险特征与识别信号各异：投资诈骗常承诺超高收益；电信诈骗多索要验证码、屏幕共享或私人转账；保健品诈骗多始于免费体检或旅游推介。

2.3. 老年金融受骗风险中社会支持的双面性审视

老年金融诈骗的社会支持分为非正式(家庭、亲友互助)与正式(社区、金融机构等)两类。二者通过不同机制影响受骗风险，呈现非线性与情境依赖特征。家庭支持可提升防范意识，但熟人社交可能成为诈骗传播渠道，形成“保护论”与“风险论”的分歧：前者强调支持的数量可补齐信息短板、缓解孤独；后者指出过度支持或盲目信任熟人易导致判断丧失，增加风险。二者对立折射出传统线性视角的局限。相关研究证实，社会支持与受骗风险并非简单线性关系[4]。适度支持(如及时风险提醒)是防护屏障，但过度(如亲友强行推荐投资)或形式不当(如仅提供信息未培养判断力)则可能转化为风险催化剂。理论张力凸显需转向非线性范式：既要通过模型确定支持“由正转负”的临界阈值，更需解析其传导机制——何种支持类型(情感/信息)、强度及情境(如高息诱惑下)会触发正向赋能或负向裹挟效应。精准识别社会支持的“质”与“量”，是破解悖论、构建有效干预体系的关键。

2.4. 社会支持在差异化诈骗场景中的作用机制

不同金融诈骗类型因其作案逻辑的差异，对社会支持的需求呈现出系统性区别。不同诈骗类型对社会支持的需求差异明显：信息不对称型诈骗需及时风险提示与权威核验；情感利用型诈骗依赖常态化陪伴填补情感空缺；信任传递型诈骗则需平衡社交网络的双刃剑效应，既利用其传播反诈信息，又防范其成为诈骗扩散渠道，需因“骗”施策。在社会支持的不同维度中，非正式支持(家庭亲友)响应迅速、情感联结强，但受限于金融知识短板与老年人隐瞒心理；正式支持(机构、社区)具备专业性与系统性，却多被动响应、难以及时干预。故构建“权威预警 + 日常陪伴”的互补模式，方能提升防护效能。此外，社会支持从“保护”转向“风险”并非随机，而是受制于特定的边界条件：支持强度是核心变量，适度的支持

能构筑防线，而过度包办则会弱化老年人的独立判断力；代际关系质量直接影响干预效果，融洽的关系利于风险提醒的接纳，紧张的关系则可能引发逆反与回避。此外，城乡环境差异显著，农村熟人社会信息传播快，易引发连锁受骗；城市虽资源丰富，但金融骗局更为复杂。加之老年个体金融素养与数字能力的差异，决定了其对支持的依赖度与易感性，这也要求反诈干预必须充分考量这些情境因素。

3. 正向赋能：社会支持的防骗保护效应与路径

3.1. 信息补给与监督制衡：风险识别的双重保障

3.1.1. 阻抑受骗风险的认知基础

老年人金融受骗的核心诱因集中体现为信息不对称、风险识别能力不足、外部监督缺位三重约束。其中，信息补给是社会支持发挥保护效应的认知前提，也是破解老年人信息弱势的关键路径。身处数字金融环境中，老年群体普遍存在数字使用能力短板，难以分辨各类金融营销信息的真假，很容易被高回报、政策扶持类虚假话术误导[5]。依靠家人、社区、金融机构以及公安力量开展反诈知识普及，可以逐步完善老年人的知识储备。在各类提醒方式里，子女的日常劝告更容易被老人接受，社区宣讲、银行网点的现场提示也能持续强化大家的风险意识。长期的知识熏陶，能够帮助老年人形成基本的判断能力，主动识别金融骗局，从思想层面筑牢防骗根基。信息补给不仅传递反诈知识，更帮助老年人建立基本风险判断框架，使其能够识别违背金融常识的收益承诺与不合规投资模式，从而从认知层面构筑第一道反诈屏障。长期稳定的信息支持能够潜移默化地改变老年人的风险认知结构，让其在面对相似情境时能够自发提高警惕，逐步改变老年人的风险感知模式，使其从“被动受骗”转向“主动识骗”，这正是社会支持发挥保护作用的基础环节。

3.1.2. 缓解受骗风险的行为约束

外部监督与行为约束是社会支持降低受骗风险的重要行为机制。面对诈骗话术的诱导，老年人常常情绪急躁、判断失当，在利益或情感诱惑下仓促开展转账、投资等金融操作[6]，一旦缺少外界及时干预，很容易造成财产损失。家庭、邻里、社区与金融机构形成的多重监督力量，能够在风险发生的关键节点及时提醒、加以制止，其中家庭监督发挥着最为关键的作用。子女密切关注长辈的资金往来与投资选择，既能直接阻断风险，也能不断强化老人的风险观念。相关调研数据表明，日常交流频繁、受到家庭有效监督的老年人，受骗概率明显下降，这一作用在农村、低学历及独居老年群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对于空巢老人而言，邻里和社区工作人员的提醒，能够有效弥补家庭监督的空缺。作为资金流转的重要关口，金融机构依托自身职能开展风险核查，工作人员对异常转账、高风险投资行为主动劝阻，已经挽回了大量老年群众的经济损失[7]。结合适老化服务相关要求，金融机构针对老年客户的风险管控也愈发严谨。公安与反诈部门的介入，则能在突发风险中守住最后一道防线。多方主体协同开展监督工作，可以构建完整的防护体系，现有研究也证明，外部监督能够拦截大部分潜在诈骗行为，是防范老年金融受骗最为直接有效的方式。

3.2. 情感抚慰与适度依赖：自主判断力的再激活

3.2.1. 缓解心理脆弱性的支持基础

老年人金融受骗不仅是能力问题，更深层源于情感需求缺失、心理脆弱性高、孤独感突出、安全感不足等心理特质[1]。其中，情感支持是降低老年人心理脆弱性、削弱诈骗情感操控的核心路径。步入老年阶段后，社交范围收缩、身体机能变化等因素，容易让老年人产生孤独与无助情绪，对情感陪伴的需求也随之增加。这种情感上的空缺，往往会被不法分子利用，他们依靠假意关怀拉近关系，进而实施诈骗。家庭、亲友与社区提供的真情陪伴，能够有效填补这一缺口，帮助老人筑牢心理防线。家人的日常

交流与悉心照料，可以舒缓负面情绪，提升心理安全感。良好的情感互动能让老年人保持理性心态，面对各类诱惑时冷静判断。当老年人在生活中收获足够的关怀，便不会轻易被诈骗分子的虚假温情所迷惑。

3.2.2. 提升风险识别力的内在驱动

适度社会支持能够激活老年人自主防范意识，推动其从被动防护转向主动防范，实现理性判断能力的再唤醒。与过度干预、包办决策不同，适度支持强调鼓励、引导与辅助，而非替代，让老年人在安全感前提下主动学习反诈知识、主动核实信息、主动理性决策，提升长期风险识别能力[8]。使其更愿意主动了解金融常识、查询信息真伪、咨询正规机构，逐步形成稳定的风险识别习惯。这种由内而外建立起来的防范意识，比外部强制提醒更为持久有效。情感抚慰与适度依赖相互配合，共同构成“外部支持–心理稳定–自主防范”的良性循环。这一机制不仅弥补了老年人的心理脆弱性、强化了其理性判断力，也使保护效应更加持久、稳定与深入。当老年人自身具备足够的防范意识与判断能力时，其在面对各类骗局时便能够保持清醒与警惕。这种内生性的能力提升，能够有效弥补老年人在信息与技能层面的短板，形成可持续的反诈防护能力。

3.3. 来源甄别与动态调适：保护效应的边界条件

3.3.1. 提升支持的可信度与甄别力

社会支持的保护效应并非无条件、均匀地发挥作用，而是受制于支持来源的可靠性、支持方式的恰当性、支持时机的精准性以及支持内容的针对性。其中，支持来源的权威性、真实性与可信度，是保护效应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老年人对信息与建议的接受度高度依赖于信任关系，而信任的建立直接取决于来源的可靠性[8]。家庭、正规社区、金融机构、公安部门等权威主体所提供的支持，具有可信度高、专业性强、规范性好的特点，能够真正发挥反诈保护作用。相反，陌生人员、非正规组织、网络主播等提供的“关怀”或“指导”，往往隐含诈骗风险。提升老年人对信息来源的判断力，能够从根本上减少其被误导的可能性。具体而言，帮助老年人区分可信对象与可疑来源，可从信任源头降低受骗概率。通过常态化教育与案例警示，逐步建立信息来源的判断标准，优先采纳权威渠道的信息，主动规避非正规来源的诱导，从而进一步巩固社会支持的保护效果。

3.3.2. 社会支持的及时性与具体性

社会支持的及时性与具体性，是决定保护效果强弱的核心边界条件。泛化、滞后、笼统的宣传教育难以触及真实风险情境，无法产生实际防护效果。反之，在老年人即将转账、参与投资、接受营销等关键风险节点，提供精准、具体、可操作的指导与提醒，能够直接阻断诈骗链条。其中，及时性支持强调在风险暴露的瞬间介入，抢占决策的窗口期；具体性支持则要求提供可操作的方法指引，包括如何核实信息、如何查询资质、如何报警求助等。动态调适则要求根据老年人的个体特征、城乡差异、教育水平、诈骗类型等因素灵活调整支持策略，实现精准适配、及时介入与具体指导，使保护效应真正落地见效。只有在合适的时机、以合适的方式提供精准支持，社会支持才能最大限度发挥保护作用，为老年金融安全构筑坚实屏障。

4. 负向转化：过度支持的助骗风险与生成逻辑

4.1. 信任泛化与盲从加剧：风险提升的外在表征

4.1.1. 提升受骗风险的信任基础

在适度社会支持下，老年人对家人、正规机构及熟人圈层的定向信任本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资源，但信任边界的无限扩张与对象的无差别覆盖会使其防护价值异化为风险缺口，主要表现为三类信任机制

的异化。在熟人信任维度，老年人长期处于熟人社会圈层，默认圈层内所有人、信息与项目均安全，不再主动核验风险，诈骗分子通过渗透老年大学、广场舞社群等场景伪装成内部成员实施精准诈骗，使关系信任沦为非理性决策的捷径；在权威信任维度，老年人对政府、金融机构等正规权威的信任具有可迁移性，在缺乏甄别能力时易盲目迁移至假冒权威，诈骗团伙虚构“国家养老项目”等身份固化“权威即可信”的认知，使其丧失对假冒权威的抵抗力；在情感信任维度，过度情感依赖模糊了理性判断与情感认同的边界，诈骗分子通过精细化情感运营塑造“贴心顾问”“干儿子”等亲密人设，持续提供情绪价值，逐步构建虚假情感信任关系，当情感信任凌驾于金融理性之上时，老年人即使面对明显违背常识的推荐也会放松警惕。

4.1.2. 加剧盲从行为的依赖机制

信任泛化是认知层面的风险铺垫，而圈层盲从是行为层面的风险落地，二者共同构成过度社会支持致险的外在传导体系。社会支持的核心价值是为老年人赋能、辅助其理性决策，但过度的社交支持会形成圈层约束与心理暗示，逐步替代个体独立判断，催生群体性盲从行为。过度支持引发的盲从行为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实现。其一，风险警惕的系统性钝化。长期处于高密度支持中的老年人会形成“圈层安全、有人兜底”的心理错觉，主动学习反诈知识的意愿持续降低，对新型骗局的认知储备显著不足，主动识骗能力更弱。其二，密集社交网络中的从众跟风强化。在封闭且同质的社交支持网络中，个体决策极易被群体意志同化。诈骗分子采用“培育意见领袖－圈层示范－群体跟风”模式，优先拉拢社群内活跃的老年核心成员，通过短期返利使其认可骗局并向圈层扩散，其余老年人则在“多数人参与、熟人可行”的群体氛围下放弃独立判断，形成圈层性盲从行为。实践中，农村群体性养老投资诈骗、城市社群集中性保健品诈骗均源于该机制——过大的同质社交网络不再是防护屏障，反而成为诈骗信息的快速传播通道，密集的社交互动持续放大诈骗覆盖面，加剧老年群体的规模化财产损失。

4.2. 决策让渡与关系裹挟：陷阱生成的内在动因

4.2.1. 风险转化的决策依赖机理

决策依赖是过度支持导致风险转化的核心机制。适度社会支持应“辅助”而非“替代”老年人自主决策，但现实中子女或其他支持者出于效率或保护心态，往往直接替其做出决策。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三条路径：第一，决策替代的路径依赖。子女长期代为处理金融事务，使老年人形成“有人替我做”的依赖心理，这一过程具有自我强化特征：决策替代频率越高，老年人的决策能力退化越快；形成“替代－退化－更依赖替代”的恶性循环。第二，风险判断的外部化。老年人将风险判断责任完全“外包”给支持者，认知逻辑从“项目是否可靠”异化为“子女或亲友是否认可”，一旦支持者判断失误或被诈骗分子利用，老年人将毫无防御地落入陷阱。第三，信息核验的主动性丧失。习惯于依赖社会支持的老年人，主动核验信息的意愿与能力同步下降，其不再主动查询投资平台资质、比对信息、质疑高收益承诺，这种信息核验的主动性丧失，使其面对诈骗信息时缺乏基本警觉，即使诈骗话术存在明显漏洞也难以自主发现。

4.2.2. 风险加深的关系绑架机理

决策依赖侧重于认知层面的机制阐释，而关系绑架则揭示了社会结构层面更为隐蔽的风险来源。在某些情境下，社会支持非但未能发挥保护效能，反而借助关系网络的约束机制，将老年人更深地卷入金融骗局。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以下四条路径。第一，熟人背书的信任陷阱。当投资项目经由熟人推荐时，老年人的风险警惕性显著降低，其深层机理在于：熟人背书激活了对推荐者的既有信任，并将这种信任“转移”至被推荐的项目。诈骗分子深谙此道，优先发展社交网络中的“关键意见领袖”，再借助其影响

力向整个网络扩散。第二，情感投资的关系绑架。诈骗分子通过长期、系统化的情感投入建立表面亲密关系，老年人将诈骗分子内化为“自己人”，拒绝对方即意味着背叛关系、否定对方的情感付出，此种心理机制使其即便产生合理疑虑也难以果断终止互动。第三，社交压力的从众裹挟。在高度密集的社交网络中，个体面临无形的群体压力，当多数成员参与某项投资时，拒绝可能被解读为“不合群”或“不信任集体”，老年人迫于群体压力而主动悬置独立判断，其核心机制为“被动裹挟”。第四，代际关系的反向绑架。当子女金融素养不足或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时，其对父母的投资建议可能恰恰导向骗局，代际支持从“保护网”异化为“风险源”，表明支持者的能力与动机决定了支持的性质与后果。

4.3. 个体特征与情境差异：风险效应的边界条件

4.3.1. 易感人群的风险特征识别

过度支持的助骗风险并非均匀分布，而是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基于认知能力、心理特质、社交特征与家庭关系的差异化表现，可精准识别过度社会支持致险的五类高危易感老年群体。其一为认知功能轻度受损群体，其信息处理、风险判断与决策执行能力均有所下降，对社会支持依赖度更高，但对外部支持质量的甄别能力更弱，倾向于不加批判地接受任何来源的“帮助”，认知功能下降是过度支持风险转化的重要个体前提[9]。其二为社会孤立与过度依赖的两极群体，社会支持与受骗风险呈非线性关系：社会孤立群体因支持不足、信息匮乏而暴露于高风险；过度依赖群体则因决策权过度让渡而同样面临高风险，两者风险生成机制截然不同。其三为代际关系紧张群体，在关系紧张的家庭环境中，老年人可能出于“逆反心理”刻意忽视子女的风险提醒，甚至更倾向于相信“外人”，使本应发挥保护作用的代际支持失效，反向推高受骗风险。其四为金融素养与数字技能“双低”群体，此类老年人既缺乏识别诈骗的基础知识，也缺乏获取与核验信息的技术渠道，对社会支持的依赖度最高，但对支持质量的甄别能力最弱，极易被低质量或恶意的“支持”所误导。其五为高社交网络密度群体，此类老年人社交网络信息传播速度快，但同质性强、异质性弱。诈骗信息侵入后，密集的社会互动加速信息扩散，而内部高度信任关系削弱了个体的风险警惕。即使个体具备一定判断能力，在密集的同质化网络中，也可能因从众压力而放弃独立决策，一旦被植入诈骗信息，受骗风险呈指数级上升[10]。

4.3.2. 风险分布的生活场景差异

除个体易感特质外，差异化的生活场景使过度社会支持的负向效应呈现出显著的场景异质性。不同场景下，风险类型、传导机制与危害程度存在明显差异。首先是独居与空巢场景，此类老年人长期缺乏家庭陪伴与即时监督，情感支持缺口显著，对外部情感供给依赖极高，易被诈骗分子的情感营销所俘获。其风险转化以“情感信任泛化”为主导机制：情感缺口催生对情感供给的饥渴式接受，使其对虚假关怀的抵抗力显著下降。同时，缺乏家庭日常监督导致骗局潜伏期延长，损失往往在造成重大后果后才被发现。与家庭同住相比，独居与空巢场景的风险转化速度更快、止损难度更大，“保护–风险”拐点在更低支持强度下即可触发。其次为数字融入与数字排斥场景，数字技能的分层塑造了两类差异化的风险场景。数字融入程度较高的老年人，线上社交与理财行为频繁，暴露于网络诈骗的概率更高，风险转化以“信息过载型”为主导，核心需求为专业的信息甄别指导；数字排斥的老年人，线下熟人社交依赖度极高，缺乏自主核验数字信息的能力，一旦接触诈骗信息，极易因信息真空而盲从入局，风险转化以“信息真空型”为主导，核心需求为基础反诈知识普及。再次为城乡差异场景，城乡之间社交结构与支持资源的差异，导致风险转化的主导机制截然不同。农村地区属于熟人社会，非正式支持网络高度密集、信息同质性强，诈骗信息传播快、圈层传染显著，易爆发群体性盲从事件，主导机制为“圈层盲从”，风险转化以“速度”为特征。

5. 结语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与数字金融全面渗透的双重背景下，老年人金融受骗已成为威胁老年群体财产安全与社会稳定的突出风险点。本研究基于社会支持理论，通过审视老年金融受骗的群体画像与多元类型，深入剖析了社会支持在防范与诱发金融诈骗中的双重角色。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并非单向度的“保护伞”，其对老年人金融受骗风险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即“适度则利，过犹不及”，继而揭示了社会支持的“双刃剑”效应及其内在生成逻辑。一方面，社会支持通过信息补给、监督制衡、情感抚慰与适度依赖等路径，能够有效弥补老年人的认知短板与情感缺失，构筑起抵御诈骗的“防护屏障”。特别是权威来源的及时、具体支持，能在关键风险节点阻断诈骗链条。另一方面，当支持强度超过阈值或支持形式失当时，社会支持可能异化为“隐形陷阱”。信任泛化、盲从加剧、决策让渡与关系裹挟等机制，反而会削弱老年人的独立判断力，甚至借助熟人网络加速诈骗信息的传播。基于上述发现，本研究提出构建差异化、精准化的老年反诈支持体系。针对不同特征的老年人群及不同诈骗场景，应实施分类施策。未来政策与实践应致力于优化社会支持的供给结构，既要强化家庭与社区的日常陪伴与预警功能，又要警惕过度干预导致的依赖与盲从，从而在全社会层面构建起既能守护“钱袋子”又能维护老年人自主尊严的长效防护机制。

基金项目

2026 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社会支持对老年群体金融受骗风险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研究”(项目编号：2026SJYB842)；2026 年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信任的‘双刃剑’——社会支持对老年人金融受骗风险的非线性影响及边界条件探索”(项目编号：S202613989015)。

参考文献

[1] 尹银, 张琳. 金融社会工作为老服务: 老年人的金融服务需求与应对[J].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20, 20(2): 57-63.

[2] Button, M. and Cross, C. (2017) Cyber Frauds, Scams & Their Victims. Routledge.

[3] Yao, W.Y., Tang, M.M., Liu, Z.H. and Ni, M. (2025) Social Capital and Financial Fraud among the Elderl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101**, Article ID: 104035. https://doi.org/10.1016/j.irfa.2025.104035

[4] Lachs, M.S. and Han, S.D. (2015) Age-Associated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An Emerging Public Health Issue.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163**, 877-878. https://doi.org/10.7326/m15-0882

[5] 席慧君, 平措, 岳昕哲, 郑艺苇. 信息化时代针对老年群体智能诈骗防控对策研究[J]. 社会与公益, 2025(11): 110-113.

[6] 苟春, 温静, 马之遥. 安全感与老年人受骗易感性[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2, 44(10): 2-9.

[7] 徐淋琳, 韩布新. 老年人金融欺诈易感性的影响因素及启示[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2022, 51(6): 638-645.

[8] De Liema, M., Deevy, M., Lusardi, A. and Mitchell, O.S. (2018) Financial Fraud among Older Americans: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75**, 861-868. https://doi.org/10.1093/geronb/gby151

[9] Noriega-Makarskyy, D.T., Lim, A.C., Upal, S., Weissberger, G.H., Fenton, L., Nguyen, A.L., *et al*. (2025) Financial Exploitation Vulnerability and Social Connectedness in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without Dementia. *Aging & Mental Health*, **29**, 1130-1134. https://doi.org/10.1080/13607863.2025.2475331

[10] Beach, S.R., Schulz, R. and Sneed, R. (2018) Associations between Social Support, Social Networks, and Financial Exploitation in Older Adults. *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 **37**, 990-1011. https://doi.org/10.1177/0733464816642584